



“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

——穆旦诗友记忆中的《赞美》

陈杰



1942年至1943年间，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前后摄于昆明

今年高考语文全国一卷的作文题，题干材料选取老舍、艾青、穆旦三位现代文学名家的名句，引发考生联想、思考，写出文章。穆旦的名句是：“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，/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”出自2004年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的诗篇《赞美》，也是这位“九叶诗派”诗入选各种选本频次最高的诗篇。对很多人来说，穆旦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，因此，不必在全国高考第一天惊呼“谁是穆旦”。

穆旦于1941年12月创作了《赞美》这首诗，发表于1942年2月16日问世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文聚社的刊物《文聚》创刊号，且作为“头条”刊出，诗人时年24岁。此时他已受聘西南联大外语系助教一年余，3月，穆旦辞去西南联大教职，投身中国远征军，任司令部随军翻译，出征缅甸抗日战场。

发表《赞美》前，穆旦已创作出反映西南联大“躲警报”生活的诗作《防空洞里的抒情诗》，发表了真实记录他参加从长沙出发，跋涉至昆明的“世界教育史上一次长征”的诗歌《出发——三千里步行之一》《原野上走路——三千里步行之二》，以及日后被文学研究界公认为现代诗佳作的《蛇的诱惑》《玫瑰之歌》等，而《赞美》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这首诗实则建构起穆旦的诗人形象——

宝石出土。穆旦创作《赞美》之时，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。《文聚》杂志的主要创办者林元称，诗人穆旦对祖国和人民倾泻了海一样深沉的感情，用无数象征性的事物诉说一个民族走过的贫穷、灾难、耻辱的道路。颜色虽然深暗，调子虽然沉郁，但主旋律却是昂扬的——诗人看到了人民“溶进”了抗日洪流，激情地一再欢呼：

“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”诗人的才华当时还被埋在泥土里，我们决定把《赞美》放在创刊号的“头条”。宝石出土，便放出耀眼的光辉，读后使人得到美的享受。”林元回忆道。

“带血”的歌。西南联大诗坛“四杰”之一袁可嘉（另三位是穆旦、郑敏、杜运燮）在《九叶集》序中说，上世纪40年代初，穆旦以何等深沉的感情赞美“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。诗篇的第二段，出现在田野中劳作农民的形象，令穆旦想到多少个朝代在劳苦大众的身边升起又降落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大众身上，如今中国民众在抗日宣传鼓动下投入了军队，“溶进了大众的爱”“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”，因为战争总是有伤亡的，穆旦沉痛地写道：“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，他没有流泪，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”穆旦痛感自己没有力量给这样的农民创造幸福，只能为他的死难痛哭，但暂时的苦难终将带来民族的复兴，因此说，“痛哭吧，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，/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。这种悲痛、幸福与自责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，使穆旦的诗显出深度和厚度。他对祖国的赞歌伴随着深沉的痛苦和严厉的自责，是“带血”的歌。

心和双脚。《文聚》创刊号只是一册薄薄24开本杂志，这期杂志上也刊发了穆旦的外文系同学、西南联大诗坛“三星”之一杜运燮（还包括穆旦、郑敏）的诗

《滇缅公路》。杜运燮后来写道：凡是读过穆旦《赞美》一诗的，都会对他在每节末重复的“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这个诗行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穆旦要以“带血的手”拥抱“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”，真挚地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，同时表达了他对多难的民族前途的希望和信心。作为穆旦一生的挚友，杜运燮说，穆旦的心和双脚总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、土地连在一起。

同期《文聚》杂志还刊发了《一月一日》和《角度》两首诗，作者是与穆旦同为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成员的罗寄一（江瑞熙）。罗寄一回忆说，穆旦以形象的语言刻画苦难中祖国的山川，赞美受饥饿、贫穷和压迫下挣扎却并不向命运屈服的人民，那江河直下般深挚的抒情引向“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的巨大希望。

1942年5月至9月，穆旦亲历缅甸战场与日军的决死战斗及随后的大撤退，在震惊中外的野人山跋涉于死亡线上挣扎，历尽艰难撤至印度。关于这段经历，穆旦写有纪实散文《光荣的远征》《苦难的旅程——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》及作于1945年9月的诗歌《森林之魅——祭胡康河上的白骨》，留下80年前抗战岁月里直面生命、歌唱英灵的代表作，足以称得上是一首庄严悲壮的安魂曲。

血肉筑长城

杨仲达

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抗战文艺回眸

著名报人、作家、书画家、《益世报》副刊“语林”主编吴云心先生（1906—1989）晚年写有《忆往五首》，其中第一首诗这样写道：“何处传来号角声，愿将血肉筑长城。深宵伫立寒风里，热血一腔更沸腾。”诗所写何事，如此慷慨悲壮，且忆及往昔仍念念不忘？诗后有题跋，称是1937年初冬深夜，诗人走天津英租界一条街上，忽然有声音自一座大楼里传出，播放后方新闻之前先广播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当他听到“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时，不禁热泪盈眶，血液沸腾。吴老又忆及，上世纪30年代他曾见友人家见到此歌的作曲者聂耳，是一个体格矮小的年轻人，看样子生活很清苦，夜里才到天津，次日还要走，当夜只好住在友人家，在地板上睡了。

查聂耳日记，他曾于1932年8月7日自上海登船，三天三夜后“漂到大沽口，由码头坐无灯火车到塘沽，搭九点半夜车到天津，住旅馆”，一宿没睡，写信二十八封，11日乘火车去北平。这和吴老所记有出入。聂耳是否还在其他时间来过天津而日记失记，也未可知。

聂耳那时已与田汉相识，成知音之交，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。1933年由田汉介绍入党。1935年2月，田汉创作完成了电影《风云儿女》的故事梗概和主题曲歌词之后即被反动政府逮捕，由夏衍接力完成剧本；聂耳看罢歌词，慨而系之，愿为搭档谱曲，但曲未谱成，他已东渡日本，未久将曲谱终稿寄回祖国。当年5月随着电影的上映，这首歌曲迅速传遍全国。

同年7月27日，田汉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出狱，此时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已成名曲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聂耳10天前在日本横滨游泳时溺水遇难。田汉于是写下《悼聂耳》：“一系金陵五月更，故交零落几吞声。高歌正待惊天地，小别何期隔死生。乡国只今沦巨浸，边疆次第坏长城。英魂应化狂涛，重与吾民诉不平。”

田汉、聂耳二人珠联璧合，合作多首歌曲，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竟成了他们合作的绝唱。

1935年末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，全国各地的学生集会，都在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此曲甚至风行海外。吴云心先生也忆及，这首歌在抗战中始终起着鼓舞人民前进的号角作用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风行之后，立即成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所发起的民众歌咏会传唱

的重要曲目。青年音乐家刘良模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，站在高凳上指挥、教唱群众的情景，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印记。之后，刘良模又在全国多座城市如广州、长沙等地宣传、教唱此曲，其中包括天津。

我读到过天津三八女中毕业生陈晶的回忆文章，说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歌咏队，教唱抗日救亡歌曲，其中的骨干分子有上海银行职员杨祖权、北洋工学院的孙景芳等，而有一次上海的刘良模到天津来，受邀到歌咏队教歌，到会有200多人。

著名国际友人、为中国抗战积极宣传的波兰人伊斯雷尔·爱泼斯坦在津时目睹了刘良模教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场景。那是1937年3月的一天，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馆中，刘良模正带领着400多人高唱此曲。爱泼斯坦得知刘良模来津后即前去采访，他也倍感新奇，在他看来，除了苦力喊的口号和化妆登台唱的京剧外，中国人一般是不唱歌的。还未入体育馆门，爱泼斯坦就听见粗犷的激昂的、强劲有力的中国新式歌声，就像一位神情紧张、声音沙哑的司令官，在发动攻击前夕，向下定决心的士兵发表最后一分钟的战斗演说。

数百人在刘良模的指挥下放声歌唱，包括中小学生、工人、店员、报童，还有拉人力车的车夫，他们都表情严肃，跟着刘良模一句一句地反复歌唱。当时的天津虽然还没有沦陷，却驻扎着4000名日军和许多日本侦探、间谍，歌舞活动的第一天，就有两个日本侦探突然闯了进来，刘良模镇定自若地用更加有力的手势鼓励大家继续高唱。

歌咏活动结束后，爱泼斯坦问刘良模为什么要开展这种歌咏活动，刘良模回答，我们的许多同胞不识字，向他们发表抗日演说，会遭到逮捕，而歌曲可以把抵抗的口号通过人们的嘴传开，这种群众性的歌咏活动，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团结的重要性。当采访结束时，刘良模紧握握住爱泼斯坦的手说，有朝一日，我的歌咏队将会变成战斗队！爱泼斯坦为刘良模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中国青年所深深感动，他很快写出了一篇题为《反抗的歌声》的报道。

此后在天津街头，爱泼斯坦还注意到有工人一边走一边哼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。两年后的1939年，他那本记录了1937年和1938年中国战况的书——《人民之战》在英国伦敦出版，其中一节是《抵抗之歌》，再次写到天津人歌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故事。

一群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甘愿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，这样的民族不可战胜！

题图：《电通半月画报》（1935年6月第2期）刊载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歌谱

万国长途竞走大会

李杨



比赛正式开始。冲在最前面的是朝阳体育会的林炳辉，其余人尾随其后，来自南开大学的刘文林险些被绊倒，踉跄了几步又重新奔跑起来。自行车保镖、裁判和医生专车则跟在队伍的最后。为确保比赛万无一失，路线也临时封锁起来，与赛事无关的任何车辆和行人均不能通过。

比赛队伍来到今解放北路与大同道交汇处时，来自新学书院的金富贵一马当先处于领跑位置，意大利人派克紧随其后，跑至法租界蓝牌电车道附近时，金富贵被派克超过，英国人恩丁汉也跟了上来。来到繁华的劝业场，观赛市民里三层外三层，叫好声、加油声不绝于耳，此时恩丁汉超过了派克，暂时处于第一位，金富贵处于第三位。到了赛程后半段，美国人阿伯瑞斯、英国人斯洛提在东南角超过了金富贵，排名第三、第四位，金富贵虽然已落至第五位，但他依旧拼尽全力，尽量缩小与前方选手的差距。

东马路上观赛的人更多，赛会秩序员虽然在竭尽全力维持秩序，但还是抵挡不住热情高涨的人们。

在一连串掌声中，恩丁汉率先冲过终点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名也陆续抵达，金富贵第五个冲过终点，来自南开大学的张焕忱以第六名的成绩完赛。随着最后一名选手的到来，比赛在下午4时左右结束，前十名选手中有三名是中国人，除金富贵和张焕忱外，青年会夜校的张士明位居第十名。

同据《大公报》报道，颁奖仪式上，裁判长李爱锐在致辞中说：“长途赛跑并不只是给人们比赛机会，而是给本埠民众一种更深的印象，引起他们运动的兴趣，越野赛跑原来应当在野外举行，为什么要经过各租界呢？乃是要引起各租界民众的兴趣。这次参加的人很多，可以证明天津市民对体育很注意并且成绩也很好，希望明年举行的时候人要更多、成绩更好。”

李爱锐出生于天津，父母是苏格兰人。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，他以47秒6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跑的奥运纪录，一举夺得奥运会冠军。1925年回到天津后在新学书院担任教师，金富贵就是他的得意门生。金富贵在比赛中表现出的坚持到底、决不退缩的意志品质，正是李爱锐想向学生传达的人性弧光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，李爱锐面对日军的铁蹄毫不畏惧，毅然决然地与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，这种人性弧光一直伴随他直到生命的尽头，至今他的故事仍不断被讲述和传颂。

题图：1931年1月11日《大公报》第8版对“万国长途竞走大会”赛事的报道



中国画
孙家潭

何谓诗心？宗白华先生在《美学散步》中谈道：“艺术家禀赋的诗心，射映着天地的诗心。”其实此“心”不独诗人有之，是人人与生俱来的一片向真、向善、向美之心，是剥离了功利尘滓的艺术心灵和审美胸怀，以声律观照之，便是“诗心”，而“文心”“琴心”莫不如是。《诗诀》说：“位高者为俗累，无位者累于俗。为俗累者无诗心也，累于俗者无诗身也。”解会古人之诗心不易，护持自家之诗心尤难。

新近出版的《诗心论粹：古今诗词读解漫笔》一书，收录天津文史学者魏暑临诗论文章六十六篇，或已刊于报端，或为旧作序跋，或是会议发言稿件，内容则商量旧学、欣赏奇文、辨析疑义兼而有之，虽非成于一时，而主旨皆不离“诗心”二字。全书立足传统诗学根基，贵在无学究气，也不作机巧语，似淡实腴，读之如食橄榄。其中《王安石的态度——从〈明妃曲〉的读解谈诗人意旨的揣摩》《哀乐诗论》的误差——谈王夫之《采薇》诗论的动机与得失》这两篇文章的格局较乎学术论文，然而论文的写作有其程式，作者心态也难免一下严肃起来，但仍从容落墨，娓娓而谈。所以，全书行文保持温润平和，不激不厉，兼有学者之识与文人之趣，让人时有阅读传统诗话之感。

古人论诗，分“能之者”与“知之者”，前者长于技法规矩、兴会灵感，后者长于义理剖析、源流考镜。然而古之能者非不知，知者也非不能，只是性灵与识断各有偏长而已。今天诗词创作和鉴赏则往往殊途，鉴赏者如果疏于吟事，则难免将诗词当成一个“外物”来观照，就如同远离庖厨的美食家，纵使得味，终隔一层。“还是诗心



苦，堪消蜡面香。”“屏山屈曲帘波皱，写入诗心一样清。”“清”“苦”的味道，非有茎柢拈断的真实体验者不能领略。魏暑临为叶嘉莹、刘崇德等先生之再传弟子，又多与学界之耆旧、诗坛之名流相往来，常年耽于吟咏，洵为作手，故能于古人用心处独具只眼。如《有趣的诗句倒装》《节奏的灵活与局限》等篇既谈读法，也谈作法；又如《改诗的读诗法》一文写道：“改诗而读，虽然多见于修辞层面的论析，却不限于此，如能关注艺术背后的机理，就更见功力。”“改法”实为“作法”的延伸，诗家常用来练习炼字功夫，所以可成为转换作者与读者视角的枢机。

魏暑临有自作诗云：
辨析无妨试浅深，好循诗艺探诗心。
推敲力戒轻常理，参酌时相证吟。
必向浑成分璞玉，每因细密鉴金沙。
天真不改兼顾哲，领悟人情达古今。

这大约便是其思考与写作理路的自述，可谓“善把金针度与人”了。

魏暑临于牙韵之外，以金石书画尤为擅长。文化史上诗书兼善者代不乏人，不但以书

法呈现诗词为一大传统，用诗词形式来讨论书法，亦有操斧伐柯之妙。善书者对诗词中的文人精神、审美趣味有天然的亲近感和更深的文化认同，也便于打通视觉形式与文字艺术之间的壁垒。本书中关于启功先生诗作的几篇文章即属此类，如《启功跋汉砖拓本诗》一文，解诗之外兼及金石考订，《启功论书绝句》的注释则涉及书学领域的讨论。所谓“功夫在诗外”，于此可见。

书中还有一类文章尤具价值，即对天津乡梓诗学的钩沉。华光甫在所辑《天津文钞》序中曾言：“仅以文字论，海内文人所有者，吾乡莫不有之。”自清季迄于近代，天津诗文名家辈出，堪称北地风雅渊薮。魏暑临学有渊源，曾为吴玉如、寇梦碧、陈机峰、张牧石等著宿作传，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，用功颇深。本书中《张伯驹代陈机峰悼亡词》《张牧石诗词辑校序》《王崇斋谈诗鸿爪》等文，记述翔实，言之有据，可视为天津近现代文学史的可贵资料。

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，魏暑临于古今诗心可謂探骊得珠，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。诗心幽眇，代有解人，此书可谓得之。

古意深中得 诗心静外游

——《诗心论粹：古今诗词读解漫笔》读后感

石玉

《重建滕王阁计划草图》，看来只有对《营造法式》研究精透的梁思成才能使之承继宋式建筑的风格，并使这座新阁的建筑艺术造型达到极高水平。我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，但站在钢筋混凝土所建的阁上，内心还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建筑材料与工艺的完全不同，让我相信自己看到的只是唐宋滕王阁的一个幻影。

这座滕王阁自古至今已是第29次重建之阁。

新阁净高57.5米，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，为典型的宋代楼阁“明三暗七”格式。其中明层皆有回廊，可俯瞰赣江景色，南北有回廊连接着“压江”和“挹翠”两个辅亭。这是仿宋朝木结构样式的直接证明。

滕王阁历经何经重重磨难？一时难以尽述。我突然对其前28次修葺发生了探究的兴趣，但这个问题是综合性的，几句话是说不清道不明的。唐代5次、宋代1次、元代2次、明代7次、清代13次的历次修葺，致使滕王阁的建筑规制多有变化。有清一代自其中叶国运式微、内忧外患，滕王阁似也自甘与之同命运，13次的频繁兴废也是累

世无双。自清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至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凡260多年间，先后毁于火灾7次，再遭兵燹2次，自然损坏而倾圮又经4次。每次重修，时过境迁，均不如唐、宋、元、明四代，建筑规模日趋缩小，为了粉饰，甚至采用了一些民间土办法，意欲蒙混过关了之。这都有晚清的旧阁照片可证。

记忆是承载于文化之中的。滕王阁在古代一直被视为吉祥风水建筑，在世人心目中占据着神圣地位。基此一点，历朝历代无不重视和保护滕王阁。正是因了这样的文化传承，滕王阁在遭毁28次后，还能再一次浴火重生。

旅游者行走山水间的一个目的在于通古知今，道法自然。既是登临，心无旁骛，临风远眺，赣江缓缓，一欲发思古之幽情；然钢筋混凝土建筑的现代感，却让我的思绪及时回溯，江面不见舟楫往来，遑论白帆片片。我想下回还会再来的。那时，我将在旭日初升之时，目追数道朝霞，在远离滕王阁的地方选个最佳位置，只看滕王阁的侧影，还有粼粼耀目的带状赣江。

都是高层建筑，何以黄鹤楼、岳阳楼之外，滕王阁